

1928年蒋介石再起考论

张安东

蒋介石1927年8月的下野是被迫的，也是“以退为进”的策略。他把在位时形成的各种无力解决的危机和困难交给桂系，接着又利用这些危机和困难，利用桂系新形成的矛盾和困境，在各派间挑拨离间，采取纵横捭阖的手段，战胜对手，取得国民党各方、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28年1月东山再起。蒋介石的再起，基本建立了“统一”的蒋记中央政权，揭开了其在大陆22年独裁统治的序幕。本文拟就这一过程作出考察和评价。

一、下野：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标志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但是，叛变了革命的国民党并没有统一中国，就是国民党内部也没有统一，仍是派系林立，各自为政。宁、汉、沪三个国民党中央对峙，蒋、冯、阎、桂四大新军阀集团并存。尤其宁、汉、沪三方中央都争做国民党“正统”，其斗争的情况尤为激烈。

在这场激烈的争权斗争中，蒋介石处境维艰，因而不得不于1928年8月13日宣布下野。蒋介石的下野，原因十分复杂，既为形势所迫，也有策略上的考虑。

首先，汪精卫东征的压力。蒋介石叛变后，武汉政府革除蒋介石总司令的职务，决定“开除党籍，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①这时，汪蒋对立是革命与反革命对立。武汉中央“清党”反共后，反革命的基本立场一致。但是，由于两个集团的争权夺利，武汉政府继续进行东征讨蒋。汪精卫要以自己为“正统”，将南京统一于武汉中央政权之下，因而大骂蒋“罪大恶极，罄竹难书”，“蒋一日存在，即一日无国民党，国民党与蒋介石誓不两立，如欲整肃党纪，非除蒋不可。”^②同时，武汉政府叛变后，经济危机仍然严重威胁着其统治。于是，他们把东征讨蒋夺取东南的地盘看成是摆脱危机的重要出路。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武汉政府任命唐生智为总司令，何键为江左指挥，程潜、张发奎为江右指挥，共辖第四、十一、二十、三十五军等部精锐，向南京移动。

其次，李宗仁、白崇禧的“逼宫”。以李宗仁、黄绍、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帮助蒋介石发动了“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建立了南京政权，但新桂系不甘心对蒋称臣。蒋桂矛盾已非一日。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的行为，又引起了多方不满，这使桂系与蒋介石发生纠纷时，能够得到他方的同情与帮助。蒋曾密令何应钦消灭桂系，何没执行，蒋对何也产生怀疑。桂系则联系何应钦逼蒋下台。李宗仁借西讨武汉之名，将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又联络浙江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将部队开到南京周围，对南京形成包围。蒋介石为了抵抗武汉方面的东征，将主力部队全部调来防御，造成徐州空虚，直鲁军趁机进攻，徐州失守。蒋介石诿过于人，处死前线总指挥、第十军军长王天培，引起李、白极大震动。于是何与李、白串通一气，拒不执行对武汉作战的命令，白崇禧公开顶撞蒋介石，向蒋摊牌，要蒋“休息”，何支持白的意见，李宗仁表示“请总司令自决出处。”蒋介石看到局面已难以挽回，只好决定下野。

再次，蒋介石的下野，与英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有关。中国的政局激变之时，各帝国主义乘机利用军阀、政客和反动派别维护其在华的侵略利益，日本帝国主义竭力阻止国民党北伐，希望促成宁、晋、奉合作，进攻汉、洛（阳），以保护其走狗张作霖和他在东北、华北的利益。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相勾结，为保护其在长江中下游和华南的利益，为促宁、汉、洛合作反共，共同北伐奉张，与日本帝国主义争夺在华利益。冯玉祥为解除北边奉张的威胁，巩固自己，力主国民党内各派联合反奉，积极调解宁汉纠纷，强调宁汉“内讧妨害对外”，应“停止征调，共同和平。”^③李济深也主张宁汉妥协共同“北伐”。这样，蒋介石倒汪反汉的主张，得不到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内各派的支持，处于被动地位。

蒋介石的下野，策略上的考虑也是重要因素。首先，回避矛盾，缓和空气。蒋介石清楚地看到，他若恋栈不走，就成为众矢之的。特别是由于当时国民党内反蒋的呼声很高，欲统一国民党内各种势力已不可能。因此，他只好暂时下台，缓和一下空气。

其次，静观时局，伺机再起。蒋介石一走，可避开攻击锋芒，观战局外，让宁、汉两派去互相争吵，把在宁、汉调停中得到实惠的冯玉祥推进派系斗争的漩

祸。待各派系闹得不可开交之时，蒋再以公正者的姿态出面，收拾残局，坐收渔利。

二、再起因素之一：宁汉合流不合作

蒋介石下野后，张作霖等旧军阀乘南京困难之时，向国民党发动新的进攻。南京国民党为共同对付旧军阀，积极谋求宁汉妥协。于是，派桂系胡宗铎前往武汉，迎汪精卫到南京“柄政”。

汪精卫集团对于去南京“柄政”，自然十分感兴趣。汪在得到这个消息后说：“南京政府现已无人负责，事实上已不存在”，应迁都南京，但又仍坚持要以自己为中心。8月20日，汪精卫等武汉要员在庐山与宁方代表胡宗铎面晤，并电请李、白、何前来参加会议。李宗仁明知汪精卫以合法“正统”自居，要控制南京，但为打退北方旧军阀进攻，只得赴会，22日，宁汉代表在庐山会晤，表示宁汉均已“分共”，应“统一党争”，共同讨伐旧军阀。会上决定武汉政府于9月3日前迁往南京，与宁府合并。

8月下旬，孙传芳部进攻南京，南京告急。李、白、何匆忙率部迎击，在龙潭附近大败孙传芳。龙潭大捷，使南京转危为安。北方的威胁缓和了，但宁汉的矛盾又尖锐起来。汪精卫一向以国民党或国民政府的正统自居，到南京以后极力想运用政治方法统一国民党各方势力，建立起中央领导机构，吞并南京政府。桂系为了防止汪精卫独据国民党最高权力，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但必须邀请宁方元老胡汉民、吴稚晖等参加。9月8日，汪精卫亲自到上海邀请胡汉民、吴稚晖筹组并参加四中全会，可是胡、吴借口武汉清共无诚意，“匿不见面。”^④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虽见了汪，但皆反对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这时，西山会议派乘机活跃起来，参与政治分赃。结果，宁、汉、沪、桂等各派妥协，9月11日至13日，在上海举行谈话会。宁、沪两方联合反对汉方，认为汪精卫应当引咎辞职。为摆脱困境，汪精卫赞成孙科的建议，即设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临时中央机构，行使中央职权。但成立特委会只是桂系与西山会议派以及汉方的谭延闿、孙科、程潜等人事先策划的一个圈套。特委会成为临时中央，汪记中央的“正统”地位被打破了。32个特委委员中，汪派占少数，大权已转移到桂系和西山派手里。汪精卫自感形势不妙，于9月13日通电下野。

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虽被剥夺，但他并不甘失败。9月21日，汪精卫返回汉口，支持唐生智成立武汉政治分会，管辖两湖与江西，与南京对抗。南京特委会以统一为名，令武汉取消政治分会。汪、唐

置之不理。10月22日桂系发兵讨伐，唐生智兵败难支，于11月12日下野东渡日本。汪精卫与汪派人马又立即到广州继续与南京特委会对抗。

汪桂之间的对立和纷争，对蒋介石再起十分有利。11月10日，蒋介石回到上海，遂即电请汪精卫北上，会商党事。同时，蒋介石与各方反对特委会的势力串通，掀起反对特委会的浪潮。桂系受到汪蒋的共同反对，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同意停止特委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这时，汪精卫与张发奎又密施调虎离山计。一方面汪精卫偕李济深赴上海参加四中全会预备会议，另一方面指使黄琪翔发动广州事变。结果广东落入汪派手中。可汪精卫却成了攻击目标，处境至为被动。至此，汪桂相斗，两派俱伤，蒋介石的再起有了良机。

三、再起因素之二：美、日帝国主义与江浙财阀的支持

蒋介石下野前，各帝国主义虽然把他作为最具实力的新军阀代表人物看待，但由于其讨汉主张与帝国主义愿望相悖，故未得到支持。下野后的蒋介石十分清楚，欲东山再起，没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是不行的。出于这种考虑，下野后不久，蒋介石就决定远游日本，寻求支持。

1927年9月28日，蒋介石携带张群、宋子文、陈群等人，从上海乘船前往日本，以谋求日本的谅解与支持。蒋到东京后，即发表《告日本国民书》，呼吁“中日亲善”，表示什么“中国革命之迟来，与日本之安危有密切关系。”^⑤蒋介石在“中日亲善”声中，先是拜谒了日本黑龙会头子、著名的国际间谍、中国通头山满，并在住处书写“亲如一家”的条幅；又接见了蒋当年在日本新野炮兵联队当见习官生时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为其书写了“不负师教”的条幅。蒋介石还通过头山满，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参谋总长金井范三及参谋次长南次郎进行秘密会谈。在与田中义一的会谈中，田中义一表示对蒋介石“将不惜充分援助，”其先决条件：一为蒋介石必须反共；二为蒋介石必须“不牺牲日本之权利”；三为蒋介石“先行巩固南方”。田中义一说：“时至今日，最善之策，依然是先统一长江以南，俟其地巩固，再着手北伐。”^⑥通过一系列的密谈，蒋介石与日本政府达成四条密约：（一）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州特殊权益；（二）蒋决定反共到底；（三）日本支持蒋政权；（四）日本借予蒋氏四千万日元，以助蒋安定中国后，中、日两国实行经济合作。“密约共两份，蒋、日双方各持一份，以为日后交涉的张本。签署既毕，蒋先生遂挟巨资返

回，以图东山再起。”^⑦

蒋介石在日本的频繁活动，促使美帝国主义改变了观望态度，他们要把蒋介石拉到自己一边来，于是指派美国驻日特使直接与蒋谈判，签订密约：（一）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在中国建立政府，统一中国；（二）蒋政府应尽力保障美在中国的一切权益并助其发展；（三）美国政府并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及“西原借款”，作为日本不出面反对为交换条件。^⑧这样，蒋介石以投靠了美、日帝国主义，充当他们侵华工具，换得了它们的支持。

为给自己再起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蒋介石拜见了正在日本养病的宋美龄母亲倪氏，请求其同意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结果宋母答应了。蒋宋联姻，使蒋既获得了政治声望，也获得了宋氏家族财力的支持，并勾通了与江浙财阀、美帝国主义的联系。从此，“中国唯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人和中国唯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人，变成了郎舅了。”^⑨

四、再起因素之三：各方企求，殷切敦促

蒋介石刚下野，即已有不少派系请蒋复职，但蒋介石不急于复职。他要看看南京桂系的好戏。在下野之初，蒋介石曾对陈布雷说：“看他们这班人怎样搞？唉！共产党在南昌暴动，南下潮汕；孙传芳、张作霖在北方虎视眈眈，看他们怎么办？”^⑩果不出蒋之所料，桂系执掌中枢大权，一没有消除党的纷争，二没能与共产党抗争，三没有继续北伐，四更不能统一全国。短短三个月，把事情搞得很糟，因而国民党内反对桂系，要求蒋介石复职的呼声，此起彼伏。此种呼声，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1. 黄埔蒋系的企求

蒋介石身在异邦，心系黄埔。尤其对黄埔系中的蒋派分子，更为关切。下野之初，即将联络黄埔师生的任务，交给曾任总部参谋长的朱绍良和黄埔建校时担任教授部主任的王柏龄共同负责，并拨付巨款，以供应用。^⑪

当时，黄埔蒋派分子大多在何应钦所属第一路军中供职。他们认为蒋介石下野，出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的不支持，而北伐奉张集团，非蒋介石领导主持，势难收功。因此，他们对李、白、何十分反感，尤其对属蒋嫡系的何应钦，更为痛切。而且，因蒋介石下野，他们失掉庇护，在职者遭受排挤，失职者流离无生。“群情愤激，莫可言状。”^⑫其中驻扎杭州的总部直属补充第七团团长关麟征，倡先奔走。他会同第八团少校副团长郑瑞安，前赴溪口晋谒蒋介石，表达拥戴效忠的赤诚。辞别回杭州后，又与第八团中校副

团长严武，前往上海，分别晋见朱绍良、王柏龄，请示进行步骤。朱、王要求关、严两人奔走联络各部队团长以上的黄埔同学，齐集上海，举行秘密会议。经过通宵研究，决定共同签名，请求蒋介石回国复职。^⑬这样，经过关麟征的奔走呼号，黄埔蒋系分子拥戴蒋介石，终于获得一致的看法和行动。

2. 各方将领的联请

仅仅是黄埔蒋系分子的企求，对于蒋介石的复职，还不能产生很大作用。因为他们虽然是蒋介石的嫡系武装，但其时为势尚弱，不足以构成很大影响。真正使蒋介石复职的，就是南北各大军阀的联请。

首先提出蒋介石复职的，就是雄跨中原的冯玉祥。冯玉祥当时“处于强敌及敌友难测的几面挟持之中，本身兵力不足，独当其冲，势甚孤危”^⑭，要使自己摆脱困境，唯有南兵北进。他寄希望于蒋来统一南方，然后北伐。因此，当蒋介石下野之初，他立即电请其回国复职。11月初，蒋介石回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筹备会。冯玉祥立即发电派驻南京的代表熊斌和在沪的好友孔祥熙，请转促蒋介石出山。12月1日，冯玉祥亲电蒋介石说：“……为今之计，惟防呈元东山即起，主持一切。”^⑮同时他又电请阎锡山联名发起，阎锡山响应。12月11日，阎冯联请，对蒋“十二分佩服，十二分赞同”。^⑯

阎冯联请，其声势及影响当然很大。就连“原来不支持蒋介石的几位总指挥，权衡利害及当前情势的需要，便幡然改变态度，纷纷对蒋介石表示拥戴。”^⑰第一集团军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于12月9日率所属将领贺耀祖、柏文蔚、刘峙、顾祝同等通电拥戴蒋介石复职，谓“数十万国民革命军，其统率司令，……舍我蒋公莫属。”“为巩固中央计，蒋公复出，实不应再有迟疑。”^⑱不仅如此，当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之时，冯玉祥特遣其夫人李德全，持亲笔函前往上海，专程祝贺，并力请蒋早日进京复职。紧接着，李宗仁、白崇禧以及其他将领，都陆续作了同样表示。

3. 党政方面的敦促

南北各大军头的联请，已经产生很大影响。再加上党、政方面的敦促，蒋介石更是踌躇满志。

蒋介石离南京之初，国民党中央推派胡汉民等赴沪挽留未果。9月下旬，蒋介石准备由沪赴日，胡汉民等再劝勿作远行，并促东山再起。但蒋介石不为所动。旅日期间，国民党方面不少人函电纷驰，期盼蒋介石回国复职，连反对蒋介石甚力的汪精卫也不例外。汪精卫在蒋介石下野后，不仅没有坐上国民党第

一把交椅，且倍受排挤，饱经流徙。所以汪精卫在12月3日国民党上海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率先提出请蒋介石复职的议案，要求“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⑨预备会议通过提案，并决定由主席于佑任签名，致函蒋介石请求复职，且通电全国各党部一致敦促。

五、再起：蒋介石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的起点

至此，蒋介石获得了国民党内各派系、各大军头的一致拥戴。但蒋介石仍故做姿态，再三推辞，因为蒋介石再起的障碍没有最后消除，这个障碍便是汪精卫与胡汉民。汪精卫与胡汉民是国民党内著名元老，资历甚深。与他们相比，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资力要浅得多。因此，汪、胡将是蒋介石再起后独揽大权的障碍。蒋介石寻机驱汪排胡。

1927年12月11日，趁粤桂军阀混战，粤军主力离广州之机，中国共产党人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广州工人举行起义。由于优势敌人的猖狂进攻，起义遭到失败。广州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李济深、李宗仁、吴雅晖等，立即抓住这一事件，对汪派发动新的攻势。他们声称，广州起义是汪精卫和共产党合演的双簧。汪精卫企图依仗蒋介石的支持，挣扎反扑，但在各派急风暴雨的袭击下，难以招架，躲进医院，称病谢客，蒋介石认为驱汪时机已到，一方面资助三十万元巨资给李济深攻打在广州的张发奎、黄烈耀的第四军；一方面，以十分“关切”的姿态“劝告”汪精卫暂时离开上海，汪精卫在上海无法立足，只有秘密离沪赴欧了。

与汪精卫势不两立的胡汉民，看到蒋汪合作，便以粤桂战争为借口反对汪，拒绝参加在上海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谈话会和预备会。汪精卫出走后，蒋又故意拖延处理邓泽如等查办汪精卫集团的提案，袒护汪精卫。胡汉民认为无法与蒋合作，拟以考察为名出国，避不参加即将召开的二届四中全会。

蒋介石赶走了他的对手之后，重握南京党、政、军最高统治权就只是手续问题了。1928年1月4日，蒋由上海到南京，积极筹备召开二届四中全会。1月9日，蒋正式宣布复职。2月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

了二届四中全会。

二届四中全会是蒋介石一手策划和操纵的。1.会议集中贯彻蒋介石的意图。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运动之大敌”^⑩，决定停止联共政策。会议削弱其他派系力量，确定国民党一党专政。2.会议使蒋介石独揽国民党党、政、军大权。蒋介石在会上不仅使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合法化，而且谋取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不久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的主席）。

蒋介石施展以退为进的“下野”策略，取得了国民党内部争权斗争的胜利。蒋介石的东山再起，不仅巩固了他在国民党的地位，而且也奠定了他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的基础。

①《国闻周报》4卷17期。

②《国闻周报》4卷29期。

③《国闻周报》4卷30期。

④王芸生：《十年观潮记》1933年12月，《王芸生文集》第1集。

⑤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8卷144页。

⑥转引杨树标：《蒋介石传》第112页团结出版社1989年6月第1版。

⑦《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48页至549页。

⑧李友仁、郭仁玺：《中国国民党简史》（1894—1949）第113页，档案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⑨荣孟源《蒋家王朝》第38页。

⑩王泰株：《陈布雷外史》中国文化出版社。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传记文学》[台]1983年第42卷2期。

⑳《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全会资料》上册第510页。

（责任编辑 汪高鑫）